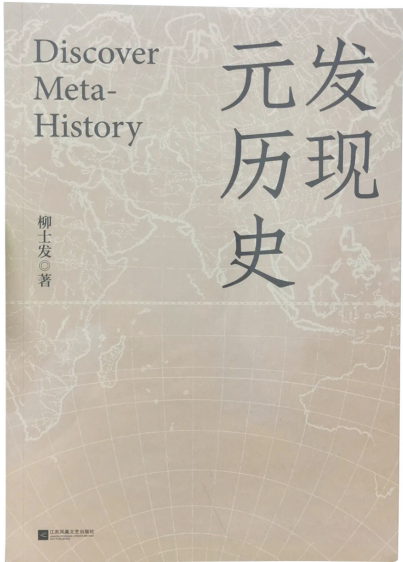


■ 学者导读

又读《发现元历史》

柳士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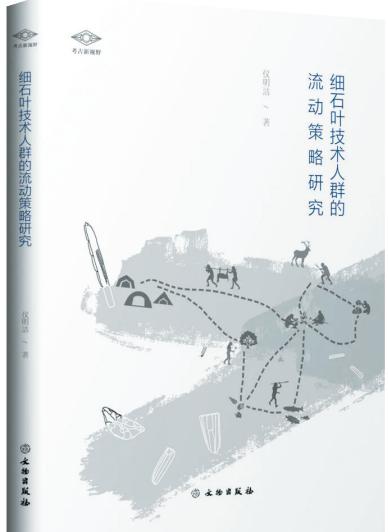


行榜和传家谱、才子佳人和奇人异士的流水账和故事会。对于文明根系和谱系研究而言，厘清神话根系和谱系、族群根系和谱系以及语言根系和谱系比深究帝王世系和谱系更加重要。把改朝换代作为历史界标的朝代史观早已过时，回到历史本体和历史主体，审视历史本相和历史主线，注重时段大范围，强调深层次广视域的大历史观和元历史观正在兴起。古代中国的千年大螺旋、万里大回环，共同描绘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历史大回旋的宏大图景。虞夏之变是中华古朝时代与中华王朝时代的历史界标，轴心政治制度和范式实现从赐姓命氏为主的姓氏时代向封土赐民为主的国家时代跃迁。三皇五帝作为古朝时代古皇古帝的代表与象征退隐进入神话传说，夏商周分别作为第一王朝、第二王朝和第三王朝登上历史舞台。如果说虞夏之变属于一级历史质变和一级历史相变，那么夏商之变和商周之变属于中华王朝时代内部的二级历史质变和二级历史相变。周秦之变是中华王朝时代与中华皇朝时代的历史界标，轴心政治制度和范式实现从封土赐民为主的国家时代向封官赐爵为主的郡县时代跃迁。从秦朝直到南朝陈代可谓中华第一皇朝和

历史从来不只是帝王将相和达官显贵的排

见微知著——《细石叶技术人群的流动策略研究》读后

张萌



细石叶技术是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的巅峰。史前狩猎采集者将剥制出的细石叶镶嵌于有机物的沟槽中，从而形成复合工具。镶嵌有细石叶的矛前端兼具石质尖状器的杀伤力与有机尖状器的韧性，且能节省优质石料，并具备便携性和可维护性，十分适合高度流动的觅食生活。复合矛尖与矛杆衔接，在投掷器的帮助下延长手臂，增加射程，可用于长距离狩猎。这些优点使细石叶技术成为晚更新世，尤其末次盛冰期以来最理想、最实用的石器技术之一。万事皆有利弊，细石叶技术的代价就是延长制作时间和增加工艺复杂度，他们不得不注重各种原料的采办、杀伤性和韧性的平衡也使狩猎必须更多依赖于集体协作。虽然我国已发现了不少含有细石叶技术产品的遗址，也有不少文章问世，但细石叶技术背后的史前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仍然鲜有系统论述，尤其能将细小的石器与宏大的史前史图景结合起来的专著更是凤毛麟角。《细石叶技术人群的流动策略研究》恰恰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作者仪明洁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今考古学院），之后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她在高星研究员的带领与指导下，参与了水洞沟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并完成了博士论文《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中国北方狩猎采集者的适应策略——以水洞沟第12地点为例》。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做博士后课题与任教期间，仪明洁博士继续深耕细石叶技术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同行评审的中英文论文，为本书的写作夯实了基础，并入选文物出版社“考古新视野·青年学人系列”丛书。与博士论文相比，本书的体量有了相当幅度的扩展，也从单一遗址的研究扩大到晚更新世人类史前史的规模。严苛的学术训练在保证研究可信度的同时，也拓展了学术纵深，使之成为一本能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专著。

本书从文化生态学理论出发，第一章讨论了狩猎采集者的流动策略，并引入了边缘价值理论，为后续透过细石叶技术审视人类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在第二、三章分别介绍了细石器和细石叶技术相关的研究，以及古环境变迁和文化的多样性。这是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也为水洞沟第12地点的个案铺设了舞台背景。该遗址作为博士论文主体，对石制品的细致研究不仅公布了详细的数据，对操作链和技术组织的推理也为解析人类行为提供了范例（第四章）。由点及面，从个案研究进入第五、六、七章的主题：细石叶技术的起源、中国北方细石叶技术的兴衰和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三个主题与第三章形成了呼应，是对前述现象的解释。第八章的结语，回答了从流动到定居的机制问题，总结全书并与第一章首尾圆合，形成了完整的论证闭环。

本书作为人类学与考古学紧密结合的典范，熠熠生辉，限于篇幅，仅述其二。本书具有极强的

评论

第一帝国时代，从隋朝直到南宋可谓中华第二皇朝和第二帝国时代，从元朝直到清朝可谓中华第三皇朝和第三帝国时代。如果说周秦之变属于一级历史质变和一级历史相变，那么作为中华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历史界标的陈隋之变、作为中华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历史界标的宋元之变属于中华皇朝时代内部的二级历史质变和二级历史相变。至于通常所谓朝代更迭，最多只能算是三级历史质变和三级历史相变。如果把夏商周合称前三代、上三代，那么元明清可以合称后三代、近三代。

中国古代曾经大体以秦淮一线为主线区分南北朝，有时南朝和北朝分界线向南可以到达长江一线，向北可以到达黄河一线。从大中华视角看，又可以长城一线为主线区分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大南朝和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大北朝，比如秦汉与匈奴、隋唐与突厥。江岷轴线、黄渭轴线、长城轴线、漠南轴线和漠北轴线堪称古代中国五大东西轴线。参考借鉴元朝以及明朝经验，清朝曾经对中华本部和东北满疆、北方蒙疆、西北回疆、西方藏疆四大陆疆分别实行不同治理模式，对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疆实行不同开放模式，形成九城五部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相对于西亚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文明、南亚两河（印度河和恒河）文明、中亚两河（阿姆河和锡尔河）文明以及晚起的西非两河（尼日尔河和刚果河）文明，中华文明可谓东亚两河（长江和黄河）文明。当人类文明从大陆视角向大洋视角开拓以后，整个世界又可以大东洋（太平洋）和大西洋、大南洋（印度洋）和大北洋（北冰洋）为基点，分为环大东洋文明圈（环太平洋文明圈）和环大西洋文明圈、环大南洋文明圈（环印度洋文明圈）和环大北洋文明圈（环北冰洋文明圈）。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美国和俄罗斯属于三洋（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文明，但是文明主体属于大西洋文明，英国、法国和中国皆为一洋文明，其中英国和法国属于大西洋文明，属于大西方文明范畴，唯有中国属于太平洋文明，是大东方文明的唯一代表。

《发现元历史》
作者：柳士发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7月

了一起，见微知著，真正做到了透物见人。为了进一步推动细石叶技术的研究，在此提出三个不成熟的看法和建议，供作者与读者参考。

第一，细石叶技术作为东北亚晚更新世以来的现象，更是全球细石器化的一部分，值得从多学科开展跨区域比较研究。地区间文化演变路径的异同应该如何解释？背后的动因有何不同？笔者虽从宏观生态学的视角尝试做出解释，但仍缺乏具体实证来支撑这么宏大的框架。本书的问世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具有建设意义的、真实可靠的答案，希望有更多学者能做出本书这样精彩的研究。

第二，细石叶组合的时空分布需要进行细致的分析，并对背后的影响因素开展系统性的调查。本书与朱之勇博士刚出版的《华北地区细石叶组合演变研究》形成了呼应，二者对细石叶组合都做了分期，也对技术演化和环境变迁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这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何兼顾时间意义上的文化变迁和空间意义上的技术差异？技术的限制因素和需求是怎样与环境挂钩的？细石叶技术是否代表类似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人群？细石叶技术产品之外的工具有哪些特征和意义？这些都是解答旧石器时代晚期史前史的关键问题，也希望引起学界更多的讨论。

第三，在材料积累已达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很需要透过细石叶技术的地区变异审视狩猎采集者的适应策略与决策机制。本书在结语提及多元的适应策略，包括高度流动的采食者、高效配合的集食者、相机而动的生产者 and 因地制宜的渔猎者。这四种策略代表更新世/全新世之交、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适应方式。作者限于篇幅未能展开论证，这可以作为今后的研究主题。纬度地带性（温度）和经度地带性（降水）是否会对策略的选择产生影响？这四种策略是否有混合，是否会发生转变？细石叶技术的兴衰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人类学问题，对于理解农业起源与扩散的过程十分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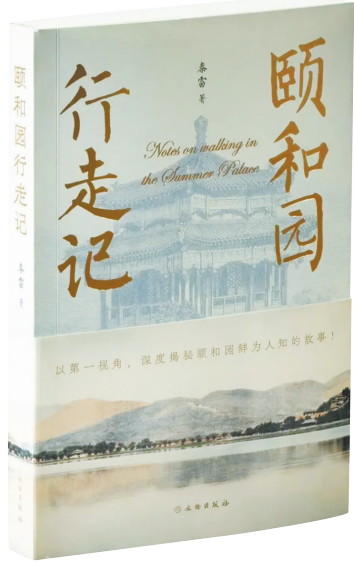
《细石叶技术人群的流动策略研究》一书的论证相当严密，但也有一些可商榷的调整建议。作者在绪论中介绍了石制品的分析方法，都是针对水洞沟第12地点的。这部分与前后文脱节，可以考虑再版时移至第四章。调整后置于石制品概况之前可能更为合适，毕竟这一部分涉及不少分类和观察项目，与水洞沟出土石制品的基本信息正好衔接。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

《细石叶技术人群的流动策略研究》
作者：仪明洁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1月

以行走之力助推三山五园研究——《颐和园行走记》读后

张超



“颐和园”是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而“三山五园”则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个范畴，康熙御苑畅春园、万园之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合在一起，统而言之即是一般意义上的三山五园。现在的三山五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是规模性的文化遗产聚集地和广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其与北京老城的面积大体相当，共同成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两大重点区域。从历史和现实双重视角而言，颐和园既是自成一体的独立空间，也是三山五园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是把握和研究颐和园两个最基本的维度。秦雷先生所著《颐和园行走记》一书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意识鲜明和身体力行的，既聚焦颐和园本身的不同面向做了举要挈繁、钻坚研微的阐述，同时也从三山五园的整体视野及颐和园与其他皇家园林的关联视角做了举一反三、剥丝抽茧的讨论，让人耳目一新、兴味盎然。

亮点纷呈，文化追求跃然纸上

以点带面，深化和扩展了三山五园研究。三山五园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和研究对象，相关研究近些年风生水起，成果一时间蔚为大观，形势喜人。颐和园研究起步相对较早，过往的研究更多是聚焦颐和园园林艺术、文物陈设、古建筑、宫廷史等，其研究水平和成果比其他三山五园单位大为领先，但纵观近二十余年的颐和园研究，从图书出版角度可以发现，大多是整理性的出版项目，个人专著较少，尽管针对具体问题的一些论文很有深度和水平，但专著成果不多也终究显得遗憾。本书不仅大大深化和扩展了对颐和园本身的研究，而且从整体上关照三山五园的意识也是鲜明的。既有宏观上讨论三山五园保护利用意义与途径的文章，也有对同属三山五园的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微观考证，从中可看出作者保护三山五园文物的主动实践和从事三山五园研究的主观自觉。

以人为本，描摹和还原了官苑人文场景。清代三山五园是皇宫和园林相结合的大型皇家官苑，每一座官苑都有突出、鲜明的政治文化内涵和丰富多彩的皇家园居生活内容，颐和园当然也不是仅仅只有山水、建筑、鸟语花香的物理空间，而是充满着人生百态，甚至勾心斗角的活生生的人文空间，政治和外交活动持续不断，传统民俗和宫廷生活气息充盈其间，一幕幕悲喜剧在此方方唱罢我登场。书中既有从德龄、容龄姐妹角度对慈禧和光绪在颐和园园居生活的观察，如慈禧和光绪接见外宾、慈禧关于画像和摄影的生活场景等，也有围绕昆明湖水操学堂的尔虞我诈和阴谋阳谋，即便是整体上看似恬淡怡人的耕织图景观也充满了动感，有男耕女织的劳作场景，也有乾隆游赏时的心旷神怡和悠远思考。而关于王国维“遽尔自沉”颐和园当日及次日的场景描写细致入微，更给人一种较深的历史代入感。

以史为鉴，回顾和总结了保护管理之路。颐和园被誉为“世界几大文明之一的有力象征”，已对社会开放110余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和政府即开始对颐和园的保护管理高度重视，全面加强。作者回顾、盘点和梳理了颐和园百余年来 的保护管理历程、取得的成绩及经验教训。可以看出，从最初的筌路蓝缕到一代代工作者勠力同心地守护，颐和园百余年的保护管理之路是一条平之路，也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奋进之路，难忘的教训、积累的经验值得铭记和借鉴。具体工作上，对慈禧画像等破损的代表性文物进行严谨细致的主动修复、对园墙文物价值的科学定位和保护性修缮、对耕织图景区的建筑修复与补配匾额楹联、对文物征集的创新探索与有效成果、对展览活动与图书出版的着力甚多与精心组织等，都是保护管理之路的重要组成。

特点突出，多彩颐和历历可见

予美景以新意。在三山五园中，颐和园（清漪园）“由于大山大水、高阁长桥、气势宏阔以及位置居中等特点，而成为整个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区的中心和统领。”作为清漪园的创建者、设计者和第一位主人，意气风发的乾隆皇帝曾用“何处燕山最畅情，无边风月数昆明”来赞美清漪园的秀丽美景。作者也有乾隆皇帝一般的观赏体验，遂不吝用优美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描绘颐和园的无尽美景，并在品味风光和工作过程中融入自己的独特见解。如对宛若仙山琼阁的治镜阁的书写，指出其“在设计理念和表现方式的完美结合上所达到的高度，堪称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罕见的经典作品”。耕织图景区复建完工后，作者受命承担补配楹联任务，在借助乾隆诗歌作品的基础上，充分体味和考虑景观特色、对仗上口、易于理解等因素，最终取得“龙睛点毕神采飞”的画龙点睛、锦上添花效果。

予人物以情感。作者笔下的慈禧、光绪不是完全威严和枯燥无趣的，其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也和常人一样生动鲜活。该书对慈禧亲近的两位侍女兼翻译德龄、容龄姐妹和荷兰画师胡博·华士，对文化巨匠王国维都做了浓墨重彩的书写和深入细致的刻画，通过对昆明湖水操学堂历史始末的考察，既让我们了解了围绕着这一机构的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斗争，又对水操学堂主人的人生际遇做了翔实和深入的追踪，展示了历史大变局背景下，尽管出身高贵但也不得不面对树倒猢狲散局面的中下层海军军人的奋斗和挫折，书中也引用了多张珍贵的人物老照片，凡此都让我们可以感知活生生的历史温度，增加了对历史人物的直观印象。在两篇应邀所写的序言中，作者还对执掌于颐和园题材玉雕创作的马洪伟先生、致力于谐趣园彩陶学术研究和科普宣传的易明先生做了热情的推介，使我们了解了社会各界同仁热心关注并参与颐和园文化事业的鲜活故事。

予文物以尊严。文物都是有生命的，也应当是有尊严的。作者对颐和园文物了然于心，如数家珍，对园藏文物的来源、沿革、数量、类别、价值，对颐和园南迁文物的数量、概况、流转、北返、分配与寻踪所开展的调查研究，对慈禧油画像这件具体文物的创作脉络、细节微观研究和对其进行修复的有关原则理念、技术细节、过程管控的全方位把握，以及充分 and 有效地运用好文物资源策划、组织颐和园南迁文物展、北京古典园林文物展等一系列卓有成效、反响良好的展览实践等均彰显了作者对颐和园文物资源的熟稔。作者重视对典型文物的征集，通过发布征集公告、推动设立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关注和参与线上线下各大拍卖会的文物竞拍，既加强了文物资源体系建设，也展现了对历史、对文物的敬畏和尊重。

观点鲜明，论从史出正本清源

关于国学大师王国维死因的论述，作者在还原具体历史细节和阐述王国维与颐和园不解情缘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关于其死亡的6种观点后，大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王国维“出于对革新潮流浩浩荡荡的时代、传统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消亡殆尽的极度愤懑和痛苦，……在特定的历史形势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舍生取义’信条的自觉实践，……在新旧递嬗的时代为旧王朝和旧文化而殉身，这本身也是一种发人深思的文化现象。”综合来看，这应当是一种较为中肯，同时也比较合乎情理、合乎史实的论断。

关于颐和园代表性景观治镜阁的建筑形态和使用功能，本书也做了综合研究，在考察大量历史文献和图文档案后，对治镜阁的建筑形象得出越来越明晰和越来越接近历史本真的认识，进而指出治镜阁作为藏密曼陀罗（坛城）的建筑形态，是乾隆时代汉式建筑技术与密宗佛教理念融汇结合的产物。作者从陈设、匾额、管理防卫等方面对其功能进行了扎实的有力的讨论，既指出了治镜阁不是宗教功能建筑，又断然否定了军事防卫和关押太監之说，明确了这里是专供帝王使用的一处重要建筑景观，是皇帝彰显政治理念、进行政治自警自励和闲暇放松游览之地。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

《颐和园行走记》
作者：秦雷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